

# 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教授的法治人生



□姜伟/口述 吴笛/整理



高铭暄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通常将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教书育人的长者尊称为“大先生”。习近平总书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话涉中国刑法,离不开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提起高铭暄教授,法律人几乎无人不晓。先生在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七十余载,为中国刑法科学建设举旗扛鼎、奋斗一生,可谓刑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法学界德高望重、令人敬仰的一代宗师。先生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是新时代教育家的典范、大先生的楷模。

高铭暄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对中国刑法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先生对刑法科学的开拓性创新、原创性贡献数不胜数,创造了我国刑法学界一系列“第一个”,有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足以载入法学教育史册。高铭暄教授身上被历史和时代赋予很多标签,每一个身份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特别是刑法科学的发展繁荣,都属于标志性贡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 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参与者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通过规范国家的刑罚权、惩罚犯罪行为,保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在高铭暄教授辉煌的法治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篇章莫过于亲身亲历并全程见证了新中国刑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

新中国刑法是在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的基础上从零起步的。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刑法的制定被提上立法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组建起草班子。高铭暄教授有幸参与我国第一部刑法起草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工作。高

铭暄教授曾自谦地说“自己是一名参与刑法制定的人员”,实际上他是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起草的唯一学者,对于刑法草案章节体例、法条内容和立法语言的规范表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参与刑法制定过程中,高铭暄教授负责汇编各类立法资料,包括党解放区的法律,中华民国法律以及原苏联、法国、德国等国刑法,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律法文本,尤其是《唐律》和《清律》,还整理了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刑事审判经验材料,为规定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提供司法实践依据。高铭暄教授讲道:“作为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我国刑法典创制的学者,我已记不清自己到底和大家一起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提了多少意见和建议,收集整理了多少资料,对每一个条文进行过多少次的草拟、修改和完善。”高铭暄教授举例说,在1979年刑法起草过程中,法律室的专家们在讨论追诉犯罪时效问题时,有人提出,如果过了追诉时效,是否可以对很严重的犯罪追诉呢?大家都建议在原来条款上增加一句,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可以由最高法核准进行追诉。高铭暄教授提出,追诉问题应该由负责公诉的最高检来核准,这个意见被立法机关接受了。于是,这个规定一直沿用到现在刑法的条款中。

1979年刑法出台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刑法的补充和修改工作也渐渐地被提上议事日程。自1981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2部单行刑法。无论是单行刑法的制定,还是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乃至其后十一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高铭暄教授始终活跃在立法工作第一线,提供了一些远见卓识的咨询意见,得到立法机关的充分重视和高度评价。1988年,刑法的全面修改正式提上国家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1993年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提出刑法总则修改建议稿。高铭暄教授主持成立了修改小组。经过深入调研、反复研讨,高铭暄教授领衔先后提出1份《刑法总则大纲》和4份《刑法总则(修改稿)》。至1997年刑法出台,在历时9年的刑法修改研讨过程中,高铭暄教授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常邀请的专家,多次参加刑法修改研讨会、座谈会及立法起草、咨询等事宜,提出一系列涉及刑法修改完善的问题和建议。从1954年第一部刑法开始起草,到1997年第二部刑法颁布,可以说,40多年的立法生涯,高铭暄教授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直接参与了新中国刑法发展的全部进程。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满头银发的长者,高铭暄教授一生积极投身于国家刑法立法工作,对刑法的创制、发展、完善居功至伟。

## 中国刑法学教育的领航者

高铭暄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教育的杰出代表,是新中国刑法学教育的先驱者。70年来,先生在人才培养、教材体系、教学方式等方面勇于探索、开拓创新,为刑法学高等教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教材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早在1956年,高铭暄教授就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集体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的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自行编写的第一部刑法学教材。这本手册作为业务培训教材,也作为办案的指引,在当时影响很大。

我国刑法颁布以后,从1982年至2003年,高铭暄教授先后主编不同层次的全国通用刑法学教材11部,囊括高等教育各个学历层次,堪称中国当时主编刑法学教材层次最高、适用最广、数量最多的学者,发行量达数百万册,为我国刑法学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高铭暄教授创造性地提出编写刑法学教材的基本思路。他指出,要编好一部教材,除了贯彻“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资料)和“三性”(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的写作要求外,还必须处理好刑法学体系与刑法典体系、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全面论述与重点突出以及编写教材与便利教师使用教材等关系。

吸引和培养顶尖人才,总书记思虑深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步子还要再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也是胆子大一点,引入更开放、更灵活的机制。”

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怀,习近平总书记无微不至。

浙江的许多科技工作者回忆说,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是我们的“后勤部长”,是科技人才的“娘家人”。他总是给科学家们送来徐徐“暖风”和“热气”,同大家一起把“冷板凳”焐热。

2005年11月17日,在杭州研发新药已近三年的海归博士丁列明,纠结了几个晚上后,决定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写一封信。

归国以来,丁列明和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一种新型肺癌靶向药的临床前研究。然而,没拿到批文,临床试验无法推进。

心急如焚之下,这封写给省委书记的信,成为丁列明和团队“最后的希望”。

出乎丁列明意料,仅仅过了5天,习近平同志就在这封信上作出批示,还在信中的关键处划了线。

根据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有关领导迅速来到丁列明的团队,了解新药研发进展和企业需求,并同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协调,推动审批加速。

科研之路道阻且长,这份关心,照亮了丁列明的追梦之路。

丁列明凭借这个项目,获得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获奖代表时,丁列明激动地向总书记表达心迹:“我们从内心感恩祖国,是祖国给了我们更好地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和机会……”

这是丁列明第一次同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面交流,总书记鼓励的目光,让他久久难忘,更加激励他一门心思埋头科研。

创新人才犹如优秀种子,很是难得,要给予特别关爱。

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省农科院调研,听说农业科技人员在科技创新中面临着困难和待遇问题,习近平详细地向大家了解相关情况。调研之后没过多久,这些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解决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如今,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们的待

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时,全国还没有体系化的刑法教科书。1982年由司法部牵头,邀请了12位刑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召开《刑法学》统编教材研讨会。鉴于高铭暄教授全程参与刑法起草的立法经历和刚刚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学术专著的巨大影响,司法部指定先生担任这部统编教材的主编。1982年年底,经过高铭暄教授和其他作者的共同努力,第一部刑法教科书《刑法学》正式出版。该书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双殊荣。《刑法学》教材在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上起到奠基架梁和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法学界和教育部门对此书的评价是:“体系完整,内容丰富;阐述全面,重点突出;纵横比较,线索清楚;评说客观,说理透彻;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它集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于一身,不仅集中反映和代表当时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成果和发展水平,而且为我国刑法学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刑法学教学和科研需要,在国家教委的组织下,先生受命主持编写一部供高等院校法学专业使用的新教材。这部名为《中国刑法学》的教科书于1989年面世,荣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高铭暄教授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刑法学》。该书为教育部组织的面向21世纪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先后十次重印,于2022年1月推出了第10版。该书注重体系的完整性以及内容的科学性和知识、信息的新颖性,出版发行以来受到了广泛好评,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和法治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荣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3年,受教育部委托,高铭暄教授主编全国第一本刑法学研究生教材《刑法学专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对此书充分肯定,向全国高校推荐此书作为刑法学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高铭暄教授70年来兢兢业业,传道授业、奖掖后学,先后开设过苏联刑法、中国刑法、刑法总论、刑法各论、外国刑法、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刑法前沿问题等课程,为我国培育了大批法治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先生常说:“我就是一名普通教师,既然选择了教书育人

降低了11%。

2019年12月30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京张高铁开通运营。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先进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

开通运营之际,习近平总书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京张高铁的重大意义,并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太空建造空间站,拥有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家”,曾是无数航天人的梦想。

如今,这个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神舟十号、十一号、十二号,习近平总书曾三次同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天地通话”。

2016年11月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同正在天宫二号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亲切通话。

看到航天员状态很好,总书记非常高兴。他说:“你们团结协作、迎难而上,体现了一流的、过硬的素质。”

景海鹏、陈冬凯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及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又同他们亲切交谈。

从高铁到大飞机,从载人航天到深海探测,从量子信息到核电技术……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工作者不断书写新时代的绚丽答卷,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变化,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人的飞天梦、科学梦展现出更远的天际。

深深关切、激发爱国情怀。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交大西迁博物馆内,一张1956年交大人的西迁专列乘车证,承载着激情燃烧的记忆。

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亲切会见了14位西迁老教授。

“从黄浦江畔搬到渭水之滨,你们打起背包就出发,舍小家顾大家。交大西迁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对西部发展战略布局来讲,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西迁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把“西迁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多个场合号召向李四光、钱三强、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

考察南繁育育种,深情赞叹“袁隆平

遇好了,看病就医更省心,有关单位还对职工住房进行了修缮,美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心多了。

2017年起,我国将5月30日设立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几年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或致信,向全国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主动靠前为科技工作者排忧解难、松绑减负、加油鼓劲,把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如今,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生动的局面正在形成,全国9000多万科技工作者正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懈拼搏奋斗。

## 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

2023年5月23日12时30分许,巍巍珠峰再次见证历史,我国13名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6年前,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发来贺信,勉励大家“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

无限风光在险峰,对科技创新来说,亦是如此。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马克思的名言,鼓励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

殷殷期盼,点燃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

2021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乘坐京张高铁来到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考察。在太子城站,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

这番话,让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副总设计师朱彦尤为振奋。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彦所在的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总书记登上装配完成的高速动车组,了解性能、设施、操作运行情况,勉励大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几个月后,京张高铁开工建设,目标瞄准建成世界最先进的时速350公里的智能高速铁路。这一速度,超越了当时世界上高铁运营最高时速,设计研制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

不舍昼夜、聚力攻关。朱彦所在团队针对空气阻力问题进行了全新设计,使“复兴号”的阻力比“和谐号”

人,就矢志不渝。”

70年来,先生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教过本科生,培养过硕士生、博士生,指导过博士后研究人员,还亲自为进修生、电大生、业大生、法官班学员、检察官班学员授课。如果听过先生的课,你就能直观体会到“大道至简”“返璞归真”这两个成语的涵义。高铭暄教授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精彩生动,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见解独到、针对性强,极富实践意识和问题导向,有口皆碑,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他的教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资深学者,他们活跃在世界各知名高校,如今已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栋梁之才。”这是国际社会防卫学会对高铭暄教授教育成就的评价。

高铭暄教授把培养合格人才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先生常说:“培养、指导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和成绩。”对所指导的研究生,先生创造性地总结出“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之道。“三严”是指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是指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是指使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主管的《高教战线》和《研究生教育》曾刊文推广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研究生的人才培养经验。

高铭暄教授在刑法学领域首倡“综述研究”方法。先生曾经谈道:“我根据研究生的课业进程,自己先做了大量功课,然后选定一个适合的课题交给学生,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全面地收集材料并且深入阅读,结合当下实际情况进行思考,最后综合各种观点和因素,写成一篇综述性论文。”文献综述教学法的推行,不仅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还大大拓展了视野,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了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培养自己的学术方向。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曾满怀深情地回忆:“我对刑法真正产生兴趣是在1983年的上半年,当时高铭暄教授给我们年级讲授刑法总论。高铭暄教授的刑法总论打破了我此前形成的刑法无理论的偏

见,尤其是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介绍,对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刑法总论讲授中,高铭暄教授布置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综述的方法,使我进入刑法学研究的入门,成为刑法学术活动的起点。”高铭暄教授在法学界首倡的综述方法,不仅惠及刑法学界,而且也被其他法学研究领域所采用。这是高铭暄教授对于中国法学教育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课堂教学方面,高铭暄教授逐步形成了“三三制”教学模式,即利用三个小时,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个课题——先设定一个课题,交由某位博士生,让他在限定时间内做好资料收集、实例调查和观点分析等工作。“三三制”看似对学生提出要求,其实最难的是教师对课题的选择。高铭暄教授曾经讲道:“一个经得起反复思考、反复讨论的课题,必须充满新鲜感,有充分的可延展性,还必须与社会实际接轨。”每次课前,高铭暄教授都费尽心思准备,找到能为学生提供广阔思考空间的课题。

“政治要强,业务上精,方法要对,作风要正,文风要好,这是我对学生们的期望。”高铭暄教授在培养博士研究生过程中,始终强调抓住三个重点,即抓政治方向、抓专题讨论和科学研究、抓学风建设,注重打基础、长能力、正学风,全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为学生严,为师者亲。先生十分关心学生成长,既有温度,又不失原则。高铭暄教授指导研究生时“严格要求”著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开功记得:“高老师指导论文严谨认真,字斟句酌,标点符号、错字、漏字、用词不当等都能给修改出来。”“多读、多写、多发表”,饱含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期许。高铭暄教授培养博士研究生近40年,绝不搞批指导,更不滥竽充数,每年仅带1人至2人,共指导法学博士67人、法学硕士11人、博士生10多人。

在赴日交流会见早稻田大学校长时,高铭暄教授曾用毛笔题写了16个字:“传道授业、培育英才、经世致用、恩泽永垂。”我以为,这也是先生对自己一生教书育人的期许和写照,彰显了先生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大师境界。

(口述者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管理者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文章摘自《民主与法制》周刊2023年第18期,略有删减)

见,尤其是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介绍,对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刑法总论讲授中,高铭暄教授布置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综述的方法,使我进入刑法学研究的入门,成为刑法学术活动的起点。”高铭暄教授在法学界首倡的综述方法,不仅惠及刑法学界,而且也被其他法学研究领域所采用。这是高铭暄教授对于中国法学教育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课堂教学方面,高铭暄教授逐步形成了“三三制”教学模式,即利用三个小时,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个课题——先设定一个课题,交由某位博士生,让他在限定时间内做好资料收集、实例调查和观点分析等工作。“三三制”看似对学生提出要求,其实最难的是教师对课题的选择。高铭暄教授曾经讲道:“一个经得起反复思考、反复讨论的课题,必须充满新鲜感,有充分的可延展性,还必须与社会实际接轨。”每次课前,高铭暄教授都费尽心思准备,找到能为学生提供广阔思考空间的课题。

“政治要强,业务上精,方法要对,作风要正,文风要好,这是我对学生们的期望。”高铭暄教授在培养博士研究生过程中,始终强调抓住三个重点,即抓政治方向、抓专题讨论和科学研究、抓学风建设,注重打基础、长能力、正学风,全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为学生严,为师者亲。先生十分关心学生成长,既有温度,又不失原则。高铭暄教授指导研究生时“严格要求”著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开功记得:“高老师指导论文严谨认真,字斟句酌,标点符号、错字、漏字、用词不当等都能给修改出来。”“多读、多写、多发表”,饱含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期许。高铭暄教授培养博士研究生近40年,绝不搞批指导,更不滥竽充数,每年仅带1人至2人,共指导法学博士67人、法学硕士11人、博士生10多人。

在赴日交流会见早稻田大学校长时,高铭暄教授曾用毛笔题写了16个字:“传道授业、培育英才、经世致用、恩泽永垂。”我以为,这也是先生对自己一生教书育人的期许和写照,彰显了先生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大师境界。

(口述者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管理者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文章摘自《民主与法制》周刊2023年第18期,略有删减)

## (上接第一版)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走在我的左侧,步伐坚定有力,但他特别注意步速,与我并行。这个细节,让我由衷地感到亲切、感到光荣!”回忆起这一幕,孙家栋记忆犹新。

重才育才,激励科技工作者奋勇前行。

2023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湛江考察,想起了他在福建工作的一段往事。

30多年前,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当地大黄鱼育苗技术专家刘家富递交的《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类养殖技术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求集中力量进行科研攻关。

“这场及时雨,为小黄鱼养殖技术深化研究提供了思路与资金支持,更为我们科技工作者持续攻关增添了信心与力量。”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刘家富感慨万千。

从“小菌草”到“大黄鱼”,一次次不拘一格选人才、打破常规用人才,实验室里的新成果变成了老百姓的“致富果”。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大上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

新征程上,广大科技工作者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争先。

## 把科技事业大厦建得更高“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

2023年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成为这项重要部署中的关键着力点。

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